

Structural Metaphor in the Preface and Text of Lu Xun's A Madman's Diary

Li Mengqian^{1,a}

¹ Institute of Literary Studies, Shanghai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Shanghai, China
^a450591807@qq.com

ABSTRACT

In Lu Xun's Madman's diary, the preface and the text belong to two different discourse systems: the traditional discourse represented by the etiquette of "cannibalism" and the "Enlightenment" discourse represented by anti-feudalism.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radition and enlightenment is reflected through the structure between the preface and the text, which forms a metaphor. The two systems are opposite at the levels of narrative discourse, narrative mode and narrator, but they define each other. At the end of the novel, the symbol of "madman", which originally belonged to the "Enlightenment" system, healed, so he went to another system. This arrangement shows the author's thinking on tradition and enlightenment. There is a huge contrast and tension between the two systems, in which we can interpret many modern and worldwide meanings, such as the doubt of all existing values, the call of human rationality, and the description of human loneliness.

Keywords: Madman's diary, enlightenment, structure, metaphor

鲁迅《狂人日记》中小序与正文的结构性隐喻

李梦千^{1,a}

¹上海外国语大学文学研究院, 上海, 中国
^a450591807@qq.com

摘要

《狂人日记》的小序和正文分属两个不同的话语系统：以“吃人”的礼教为代表的封建话语系统和五四时期反封建的启蒙话语系统。两个系统之间的结构体现出“传统”与“启蒙”的关系，形成一种结构性的隐喻。两个系统在叙述话语、叙述方式和叙述者等层面均处于相互对立又相互定义的关系中。小说的最后，“狂人”这个本属于正文系统的符号由于其“病愈”而流向了另一个系统，这样的安排可见对传统文化“吃人”真相的思考、对五四“启蒙”的疏离以及对于所谓“启蒙者”的冷淡。两个系统之间的反差与张力也形成了可供解读的意义空间：对一切既有价值的怀疑，对人类理性独立思考的召唤和对现代人与人之间隔阂与人类孤独感的描述。

关键词:《狂人日记》，启蒙，结构，隐喻

1. 前言

曾经有过从政治革命、思想革命等角度对《狂人日记》进行的解读，认为“《狂人日记》的思想是礼教吃人，这是鲁迅在《新青年》上所放的第一炮，目标是古来的封建道德，一例的攻击，便都集中在这一目标上……礼教吃人，所包含甚广，这里借狂人说话，自然只可能是照题实做，这是打倒礼教的一篇宣传性文字……他的观点，是要促进中国的思想文化现代化、

科学化”^[1]，此类解读，不论是对小说本身还是作者意图都是片面的。就文本来说，《狂人日记》可以分为小序与正文两个部分，这两个部分在叙述话语和叙述者的价值感知上甚至是相反的，若忽视其中一个部分而仅以另一个部分作为解读的对象作简单化、功利化的解读，势必造成文学意蕴的流失。至少就鲁迅对传统和启蒙的态度来说，他决不是一味地否定传统的封建道德（即书中提到的仁义礼智），也不是机械地宣传中国思想的现代化。将原本生动而复杂的文学思想

用简单化的词语进行概括也会导致对文学思想的遮蔽。

乔纳森·卡勒在《结构主义诗学》中说：“社会文化现象并非简单的物质客体和事件，而是具有意义的客体和事件，因此是符号；其次，它们的本质完全由一个内部关系与外部关系构成的系统来界定……如果要研究符号，那么就必须考察使意义得以产生的关系系统……所以……如果人的行为或产物具有某种意义，那么，其中必有一套使这一意义成为可能的区别特征和程式的系统”^[2]。受此启发，笔者认为《狂人日记》的正文和小序亦可被视为分属两个不同的系统，这两个系统分别是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认同传统道德的封建话语系统和五四时期以反封建、提倡科学与民主为代表的启蒙话语系统。前一个系统的代表性符号为叙述者“余”以及病愈后的“狂人”；后一个系统的代表性符号则是病愈前的“狂人”。两个系统在叙述话语、叙述方式甚至人物方面在互相对立、互相定义、相反相成的关系中形成巨大的张力和意义空间，此外，两个系统的结构、话语安排都是作者有意为之的，对于“狂人”这个符号由一个系统流向另一个系统别出心裁的安排也具有更深层次的象征和隐喻意义。

2. 两个系统的相遇

2.1 小序与正文

小序本身就是晚清小说中常见的，一般用来交代事物的来龙去脉，其目的在于造成一种真实感。^[3]

《狂人日记》的小序以文言写就，逻辑层次分明，虽然也采用第一人称叙述，但叙述者相当于故事外的异故事叙述者，其叙述具有极大的真实性与客观性，相较于后文，小序虽然篇幅极短，但较为清晰地交代了日记主人的身份、患病状况、病愈后的去向，还交代了日记部分的“原貌”特点及编纂过程。小序的叙述者描述日记为“语颇杂无伦次”、“不著日月”甚至对日记的墨色、字体不统一的细节也进行了交代，为了营造“可靠的”叙述，叙述者还将文本的编纂过程也记录了下来如“今撮录一篇”、“一字不易”等，此外，书名的由来、写作日期等都十分详尽。鲁迅对待小说写作向来“惜字如金”，在短短的序言里如此费力地营造一种真实感，除了戏仿中国古代小说的叙述方式之外，也有意以这种客观性与下文日记部分的主观性构成对比。

在当时看来，同小序这种古已有之的形式相比，正文部分“日记体”的小说形式是新出现的，其本身就是对古典小说形式的一种丰富与革新，“在接触西洋小说以前，中国作家不曾以日记、书信体创作小说”^[4]，五四以后，作家才渐渐用日记来体写小说。《狂人日记》日记部分用白话文写成，采用了第一人称内聚焦的叙述视角，叙述者属于故事内的同故事叙述者，在这个视角下“我”不但是叙述者，也是整个事件的经历者，通过这种视角，读者可以深入地窥见“我”

的内心活动，也可以透过主人公的目光观察事件经过。这一类的叙述往往与隐含作者的规范有一定的距离，叙述常常变现出不可靠性，这种距离和不可靠性并不是说作者与叙述者观点相反，而是叙述者本身也是隐含作者意图塑造的形象之一。布思在《小说修辞学》中提出了叙述者的不可靠性，他主要聚焦于事实和价值两种不可靠的叙述，无论哪一种，“读者在阅读时都需要进行‘双重解码’：其一是解读叙述者的话语，其二是脱开或超越叙述者的话语来推断事情的本来面目，或推断什么才构成正确的判断”^[5]。通过对狂人日记的“双重解码”，我们大致能推断出一些可能的事实，同时发现狂人叙述的偏见与不可靠。仅从表意来看，这个叙述者首先是多疑的，且具有“被迫害妄想症”的心理特征。在日记的第一章中“我”怕和小心等的原因是赵家的狗多看了“我”两眼，若说读者不在场而无法确定叙述者对于人的眼神判断究竟准确与否的话，那作为无意识的动物的多看两眼并不能作为一个人小心与害怕的理由。此外，就算是从这位“被迫害者”的日记中我们也能看出，周围的所有人对他的态度都是友好而有几分畏惧的。他走在路上，便觉得一路上的人都在议论他，有人对其张开嘴笑，他却觉得那是“其中最凶的一个”；他对着孩子们大吼，看母亲打骂儿子而大受惊吓，虽然家人因此把他关进书房，但也并不能说家人在用礼教迫害他，因为作为患有精神疾病的人，在已经对他人构成威胁时被约束和控制一定的空间里可以避免发生意外。况且，从不多的记录来看，家人和朋友有时虽然害怕他，但是都不能说不关心他：他闷得慌，想出去走，陈老五有所顾虑而没答应，但是“停了一会，可就来了开门”；大哥请了郎中来给他瞧病；在他格外和气地想要与大哥交流的时候，大哥虽然诧异，但也立刻给予了回应，他“赶紧回过脸来，点点头”对其说“你说就是”，若将主人公视为精神疾病患者，那么“狂人”这个叙述者的不可靠性就消解了“礼教吃人”的定论。

2.2 两个系统及其关系

在小序所属的系统里，“赴某地候补”便是病愈后狂人的去向，也是能够被这个系统所承认的人生目标之一，学而优则仕，本就是古代所有读书人的人生目标和价值取向。处于社会底层的民众被知县枷打、被绅士掌嘴、被衙役占了妻子、老子娘被债主逼死在这个系统里都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此外，与这个系统格格不入的“我”，也理所应当如同一只鸡鸭一样被囚禁起来，理由是“总之你不该说，你说便是你错！”^[6]。在这个标榜“仁义道德”的系统里，吃恶人的心肝被认为可以壮胆，人肉还甚至可以入药；人类可以易子而食、食肉寝皮，可以逼他人自戕；作论便是混淆是非，还美其名曰“翻天妙手，与众不同”。

相反，在正文部分所属的系统里，“我”的“怪异”行为被赋予了合理性，属于小序系统的那些看起来一切正常的事情，则都令“我”感到费解甚至害怕，在正文的系统中，所有人看“我”眼神都是奇怪的，他

们似乎都在议论“我”，当“我”作出自认为合理的反应时，“我”永远也无法理解，为什么我会像一只鸡鸭一样被关起来。周围所有人的关怀与试图进行的交流都被“我”看作有所图谋——不是逼“我”自戕就是栽一个疯子名目将“我”罩住。所谓的“仁义道德”不过是吃人行为的遮羞布，因为受这种熏陶长大的“我”周围的人都会吃人，他们会吃人，必定也会吃“我”，“我”的哥哥是要吃“我”的，请来的老中医想必也是同谋之一，甚至孩子，也有可能加入了吃人这个行为。对于周围压迫性的环境，“我”虽不解，但竭力表现出“我”不怕他们的样子：“我”大笑，自认为这笑声里充满着义勇和正气，甚至连大哥和中医老头子都被这勇气给镇压住了。除了绝不与吃人者妥协，“我”还试图劝说大哥，企图将另一个系统（小序所属的系统）的符号，纳入属于“我”的这个系统，在这个系统里，人是不断进化而来的，不吃人便比吃人要进化，因此，人们应该完全摒弃吃人的念头，只要不吃人，就会出现一个人人相爱的和谐的新社会！

两个系统的符号之间处处体现出矛盾与对立，且都希望可以把自己的符号纳入自己的系统。周围的人都认为“我”有病，是迫害狂，是疯子，大哥也请大夫试图将“我”治愈，在“我”表现出任何根据他们系统的规则无法解读或认为是有害的行为时，等待“我”的便是囚禁。而“我”当然也更加不能理解属于另一个系统的符号的意义。“我”认为他们所有人最终的目的不过是吃人，即使是“仁义道德”的字缝里也写着吃人。于是“我”开始了从大哥开始的劝转，希望他们以后可以不再吃人，运行“我”的那套规则逻辑。

虽然小序极力显示出其可靠性而日记又显得非常“不可靠”，但两个系统之间并不存在可靠与不可靠的对立，甚至两个系统也并非互相独立的，而是一种相反相成的关系。虽然小序极力表现出一种可靠性，但是它只是利用自己的话语优势将正文部分定义为一个“迫害狂”的日记而剥夺了其可靠性，并且以此可增加自己的真实性。狂人之所以被称为“狂人”是因为小序这个话语系统强将这个带明显价值取向的名目强加在了叙述者“我”身上，所谓的“病”与“愈”不过是小序这个话语系统里的一种价值判断，因为这个话语系统将小序自身粉饰得十分可靠，读者很容易掉入这个价值判断的陷阱，带着一种“不可靠叙述”的期待视野来阅读接下来的日记。读者易掉入这个陷阱的另一个原因是小序部分其实有意在模仿（更加准确的说是戏仿）中国古代小说的序言部分，因为传统的读者习惯了依靠一个可靠的叙述者，而很少采取开放而独立的态度来审视一部作品，当小序这个一向可加以依靠的对象的可信性被消解后，文本的意义空间也变得开放。若暂时将可靠与不可靠的前见悬置，而用平等的态度来认识这两个系统的话，我们也不难发现，小序并非其声称的那样可靠，因为小序的叙述者以及这个系统里的其他符号，运行的是“吃人逻辑”，还用“仁义道德”来粉饰他们“吃人”的行

径。两个系统在相互否定中还存在相互定义相互依存的关系，狂人理想中人人都摒弃“吃人”的理想社会终究是一个理想，因为就连狂人自己也得承认他有着四千年的吃人履历；而扼杀一切革新者和发出不同声音的“吃人”的社会，也一定不会长久的存在下去，因为它毕竟还养育出来一个（或者说会有无数个）如“狂人”这般敢于与几千年的文化、封建道德叫板的人物。

3. 狂人的病愈：一个符号的流动

将两个系统联系起来的，是主人公“我”。狂人的病愈使得狂人这个符号从一个系统流动到了另一个系统，其角色由坚决地“反吃人”者变动为传统道德的捍卫者，变成了“吃人者”，他亲自题名正文的日记部分为“狂人”日记并且最终赴某地候补，其前后的反差形成巨大的张力，连同狂人这个形象的内涵一起构成了丰富的意义阐释空间。

3.1 “狂人”符号的功能性意义

要探求“狂人”符号的功能性意义，首先需要回答的问题是“我”的身份，或者“我”的象征性意义，我们首先需要回答以下几个问题：首先，“我”一直害怕的是什么，“我”明确声称不害怕的又是什么？其次，“我”拼死抵抗的东西是什么，“我”是为了什么或者说是为了谁在进行抵抗？

正文曾多次表示有许多场景“我”是不害怕的：即使那七八个人交头接耳的议论“我”，最凶的还长着嘴对“我”笑，虽然这究竟使“我”从头直冷到脚跟，但“我”可不怕，而“仍旧走我的路”；即使面对“刽子手假扮的”医生何先生，要来看“我”的肥瘦，好分得一片肉，“我”也不怕，既然这最“凶”的人和明显是要来吃“我”的肉的刽子手，我都不害怕，那如此无畏的“我”究竟怕什么呢？在日记的第一节叙述者就定下了“怕”的基调：赵家的狗多看了“我”两眼，“我”便觉得“我”“怕得有理”；小孩子那睁着的怪眼睛，那似乎害怕又似乎想害“我”的眼神，以及他们铁青的脸色，真叫“我”怕，“我”不怕那些明目张胆地想要“吃人”的人，大抵是因为“死于敌手的锋刀，不足悲苦；死于不知何来的暗器，却是悲苦。但最悲苦的是死于慈母或爱人误进的毒药，战友乱发的流弹，病菌的并无恶意的侵入，不是我自己制定的死刑”^[7]。对于敌人是不必害怕的，害怕的是被护在身后人甚至是孩子们的冷眼和伤害，“我”害怕的是动物和孩子的眼神，“我”曾经呼吁“救救孩子”，为什么要救孩子？因为孩子代表着未来，是要在“我”认为的那个没有吃人的人的社会里生活的，“我”正是为了孩子们的新的时代来抗争的，当“我”发现连孩子们也难以避免吃人命运的时候，在“我”试图改变他们的生存环境而遭到关押、捂嘴的时候，这些“我”为之奋斗的人，都麻木不仁地围着看热闹，于是“我”害怕了，因为“我”的抗争已经失去了意义。

鲁迅在《呐喊·自序》里说：“凡有一人的主张，得了赞和，是促其前进的，得了反对，是促其奋斗的，独有叫喊于生人中，而生人并无反应，既非赞同，也非反对，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无可措手了，这是怎样的悲哀呵，我于是以我所感到者为寂寞”^[8]。这种寂寞或孤独正是五四时期“启蒙者”们常感受到的痛苦，与“狂人”一样，他们不怕吃人的礼教，但怕自己身后的冷眼，怕自己为之奋斗者的冷漠。

3.2 “狂人”病愈的意义

“狂人”的病愈让本属于正文系统的符号流向了小序所属的系统，小序交代了主人公病愈且赴某地候补的结局，这为狂人的日记提供了另一种可能的解读视角：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思考、对五四“启蒙”的疏离、对于“启蒙者”和“革命事业”的怀疑。

在病愈之前，“狂人”就对自我有所体认，他与自己激烈反对的“仁义道德”有脱不开的干系。自认为不吃人并且反对吃人的“我”有了“一件大发现”：那些合伙起来要吃“我”的人里，就有“我”的哥哥，“我”虽然不吃人，却是吃人者的兄弟，“我”即使被人吃了，可还是吃人的人的兄弟！“我”反对仁义道德的吃人，并且想要创造一个完全脱离吃人道德的社会，结果发现就是自己也无法摆脱吃人，因为“我”就是吃人者的兄弟，“我”正是在这个吃人的社会中产生的，甚至“我”也可能在无意间也吃了亲生妹子的几片肉。在文本中“我”曾经用进化论的观点试图劝哥哥放弃吃人，认为旧的道德是建设新社会的羁绊，只有和过去完全决裂，才能建设一个新的社会，然而新的东西永远根植于旧事物，历史无法越过，新事物而只能作为传统的更新而存在，传统是革新的基础。中国的传统文化源远流长，一朝一夕间将其摒弃以一种全新的文化来替换它是不可能的，以完全摒弃传统为目标的革新只能是空中楼阁，因此，“我”也不可能在吃人的社会中凭空建立起一个新的、不吃人的社会。

对于革命，鲁迅是失望且颓唐的，对于新的运动，他在当时是并不认同的，他曾坦言自己“对于‘文学革命’其实并没有怎样的热情，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于是失望、颓唐得很了……‘鲁迅多疑’是不错的，我正疑心这批人们也并非真的民族主义文学者，变化正未可限量呢！”^[9]。不论对革命还是革命者鲁迅都是绝望的，他认为铁屋子万难破毁，革命不是一朝一夕之事，也不是由几句煽动性的口号构成的、随时可以拿起又放下的旗帜，而是一个长久的，甚至永不停止的过程。如主人公“我”那般极端地呐喊反对、无力地劝说等方式，也许可以让人们觉得新奇而引来围观，但绝不会有任何的启蒙功效——一个系统的语言规则和话语，如何能如此轻易地被另一系统所接纳呢？作品中对于“狂人”病愈候补结局的设定，可以视为作者对于五四时期所谓“启蒙者”一种忠告甚至是对其启蒙方式的否定，曾经的战友一个个退场甚至站在了对立面，就像狂人的病愈，正说

明他同自己与那些曾经竭力反对过的人正属于同类。

4. 小序与正文的结构性隐喻与丰富的意义空间

在一定意义上，小序与正文的关系正是传统文化的话语系统与五四启蒙的话语系统间关系的隐喻，这个关系的呈现不是通过直白的说教，也不是通过某个意象，而是通过如文本的篇章结构、话语安排、叙述方式、叙述者的形象等文学的手段，这正是作品的文学性的所在，也是这部小说能够成为经典并且不断被经典化的原因之一。小序与正文分别所属的两个系统在很多方面无疑是对立的，例如文言与白话、小序形式与日记小说、第一人称“可靠”的叙述与不可靠的第一人称内聚焦、“迫害狂”与“吃人者”等等，故事在两个系统的规则下有了不同的解码：一个系统认为日记是一个迫害狂者的“荒唐”之言，整个故事是一个患有精神疾病的人发病后又病愈的过程（连日记的作者“我”在病愈后也这么认为）；在另一个系统的规则下解读出来的则是“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我”处于吃人社会中绝望的呐喊，这可以看作是对五四时期启蒙主义同传统的儒家文化之间对立关系的一种隐喻。

但是，两个系统的意义不在于其自身，而在于彼此之间的结构与关系，它们是互释的，两个系统的符号之间有着不可忽视的联系，即使是狂人自己，也不得不承认其有着四千年吃人的履历。连这个系统在文本中唯一的代言人“我”也无法与这个吃人的社会脱离关系，甚至可以说这个社会的本质也就是“我”的本质，因此，这也正说明了“但只要转一步，只要立刻改了，也就人人太平”的启蒙方式只是在痴人说梦而已，几千年形成的传统岂能“转一步”就能“立刻改了”？即使改了，怎就见得“人人太平”？

小序与正文之间相互对立又互相依存的关系形成了巨大的张力与丰富的意义空间，在这个空间内蕴含着很多既是“鲁迅式”的又具有世界性的形而上的意义。

首先是对一切的怀疑，对任何既有的价值范式表示怀疑是20世纪世界文学共有的特征之一。鲁迅确实是多疑的，他怀疑现实、怀疑“天理”、怀疑人性与希望、怀疑死亡（可能的解脱方式）、怀疑自己甚至怀疑“怀疑”本身。在《狂人日记》中，怀疑是通过不可靠叙述的“双重反讽”体现出来的，这是一种结构性的反讽，不但通篇都具有讽刺的效果，而且其内部也由于小序与正文属于不同的话语系统而相互排斥、相互解构形成了反讽的结构。仁义道德若是中国落后的原因因而值得怀疑，那所谓的“反吃人”的启蒙就能够拯救中国吗？若日记部分因为明显的不可靠叙述而值得怀疑，那表现得“十分可靠”的小序部分又如何去怀疑呢？笔者认为，小序是作者对中国古代小说的叙述模式的一种戏仿，以往的中国读者太依赖可靠的序言了，因此并不对序言所秉持的价值判断

表示怀疑，站在小序的立场，被预先定义为“狂人”的日记自然是不可信，但若站在“狂人”的立场，想要借礼教“吃人”者也未必不是满口谎言，因此，正文部分直指小序的叙述者及其同系统的其他符号对序言的可靠性进行了解构，破除读者对于叙述者的依赖，引导读者用怀疑的眼光来看待世界，召唤读者独立的思考：如果两个系统都应该被怀疑，那么什么样的系统才是合理的呢？在这样一种辩证的思考中，文本的意义也得到丰富。

其次，置身于荒原之中的孤独感。20 世纪的文学有一个相对普遍的主题：人与人之间的隔阂与交流的不可能。同时代几乎各民族文学都通过不同的手法对这个主题有相应的表现，例如卡夫卡的《变形记》用夸张的手法将主人公格利高尔设为一个与众不同的异类——直接变成一只甲虫。他的公司抛弃他，他全家都嫌弃他，无法与这个世界交流的格利高尔最终只能在孤独与痛苦中死去，周围的人却都感到如释重负。《狂人日记》借两个系统内部及其之间的结构与关系、一个符号的流动表现出的无论进退似乎都不对的荒诞性意义、一个符号独自面对另一个系统的不平衡等手法也对这种孤独感有所体现。文本虽然有两个系统，但狂人所属的系统在文中只有狂人一个符号，而小序系统则符号众多，其中包括“我”的亲人，亲人的“围攻”与不理解使得“我”在现实生活中陷入孤独无援的境地；发现仁义道德的“吃人”真相以及“我”四千年的吃人履历并且自己就是吃人者的兄弟使得“我”在精神上陷入荒原。此时的“我”虽不属于“吃人”系统，但仍然摆脱不了“吃人”履历，最终陷入了继续坚持则被称为“狂人”放弃坚持则与吃人者同流合污的两难处境之中，文本也因此增添了荒诞性。

5. 结论

小序和正文小序和正文风格迥异，它们一短一长、一文一白、一理性客观一感性而杂乱，处处体现着对立。然而两个系统却因“狂人”的病愈而联系在了一起：那个批判这个吃人社会的“狂人”最终赴某地候补，成为了“吃人社会”的一员。在对立的基础上，小序与正文还存在相互定义、相互解构的关系。小序对后文定下“狂人”日记的基调，消解了清醒者“我”对礼教“吃人”现象的控诉，而后文对于小序中“吃人者”的狡诈又削弱了小序的客观性和可靠性。从这个角度看，作品想表达的一定不是对礼教的批判，而更应该是对传统的怀疑以及如“空中楼阁”般启蒙方式的批判，作品所呼唤的也不仅仅是“救救孩子”，更

是面对传统与现代相冲击时的理性与怀疑。

作为中国第一篇白话短篇小说，《狂人日记》给了中国现代小说一个十分高的起点。文言写就的小序使它保留有传统文学的特质，而正文部分不可靠叙述者的第一人称叙述，对孤独和隔绝的描写以及对既有价值的怀疑等又使其同二十世纪世界文学接轨，在权威被解构的时代，许多知识分子、先觉者产生了如同置身于荒原之中的孤独感，他们不被环境容纳，试图与他人沟通却以失败告终，最终不是在这个环境里死去便是让环境同化了自己。

文学所产生的时代会成为过去，文学所讲述的时事也将成为历史，但文学经典不会随之过时，经历过时间的打磨与过滤，经典的文学将不断被“经典化”。

REFERENCES

- [1] Cao Juren. (2011) Lu Xun's chronolog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Beijing.pp.30. Zhou Zuoren also has a similar view, see Zhou Zuoren. (2013) Characters in Lu Xun's Novels. Beijing October Literature and Arts Publishing House, Beijing. pp.19.
- [2] Culler, D. J. (1991) Structuralist Poetics. China Social Sciences Publishing House, Beijing.pp.24-25.
- [3] Wen Rumin, Kuang Xinnian. (1990) Madman's Diary: the maze of Irony -- a discussion on the structural significance of the "preface" in the whole novel. Lu Xun Studies Monthly,08:31-34.
- [4] Chen Pingyuan. (1988) Transformation of narrative mode of Chinese Novels.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Shanghai.pp.203.
- [5] Shen Dan. (2009) Narrative, style and Subtext.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Beijing.pp.59-60.
- [6] Lu Xun. (2007) Loners -- Lu Xun's Novels. Zhejiang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Hangzhou.pp.13.
- [7] Lu Xun. (2005) The Complete Works of LU Xun.Vol.3.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Beijing.pp.51.
- [8] Lu Xun. (2007) Loners -- Lu Xun's Novels. Zhejiang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Hangzhou.pp.5.
- [9] Lu Xun. (2005) The Complete Works of LU Xun.Vol.4.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Beijing.pp.468.